

大清臣民與民國公民之間？——以新政 時期萬壽聖節為中心的探討

小野寺史郎*

吾國自推翻專制改建共和以來，莫不效法於美法。即紀念問題，彼邦人士甚為注重。吾國今欲立民國立國紀念。¹

法國國節含有革命性質，美國國節含有獨立性質，故法美各國均以革命獨立之日為國節。我國國節亦應效法法美，自是一定辦法，即以武昌起義之日為國慶日。²

竊以為世界有永遠紀念之日三。一為美之七月四號。一為法之七月十四號。一即我中華民國之十月十號是也。³

*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¹ 施作霖在教育部臨時教育會議上的發言。〈規定民國立國紀念日〉，《順天時報》(北京)，1912年7月20日。

² 參議院覆政府諮詢案。〈國節日效法法美〉，《申報》(上海)，1912年10月1日。

³ 宋教仁在第一屆國慶日共和紀念會上的演說。〈宋遜初演說詞〉，《民立報》(上海)，1912年10月17日。

1. 前言

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在 2000 年的著作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中主張：辛亥革命以後在中國出現了新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所謂新的政治文化包括：懸掛國旗、穿西裝、男性剪辮、女性廢除纏足和進入公共領域、使用西曆以及慶祝國慶日等等。哈里森認為，通過這些政治文化，出現了新的國族認同感，而一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以參加這些政治文化活動來表達自己對民國的忠誠。這個新的國族認同概念就是「民國公民」(republican citizen)。⁴

哈里森的著作發表之後，對近代中國政治的儀式與象徵符號的研究開始盛行。筆者以前亦發表過一篇文章，探討國慶日的成立過程，⁵ 另有姜瑞學與李學智的文章論及此題目。姜瑞學主張：北京政府試圖通過動員民衆參加「雙十節」的儀式活動，來獲取民衆對中華民國的認同。⁶ 李學智批評姜瑞學，指出：北京政府時期的國慶活動經歷了由民初的官民一體共同慶祝，到後來國慶活動中官民分立與對立的變化過程。1920 年代以後，國慶活動成爲各界民衆表達政治意願，進行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⁷

然而，以上眾文章均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民國初年國慶日所具有的劃時代性質。例如藤谷浩悅指出：以往清政府將民間信仰吸收在國家祭祀之內，試圖寬鬆地統合地域社會。但 1900 年庚子事變以後，清政府開始以「文明」與「富強」爲目標，將以城隍賽會爲代表的地域社會風俗，視爲「野蠻」行爲而加以壓制。⁸ 因此，現在有人提出了強調辛亥革命前後的連續性，將 1900 年之後

⁴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⁵ 小野寺史郎，〈民國初年の革命記念日——國慶日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民國初年之革命紀念日——圍繞國慶日之成立)〉，《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20 號(東京，2005 年 6 月)。

⁶ 姜瑞學，〈北洋政府與中華民國國民塑造——以“雙十節”爲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13 期(聊城，2006 年 5 月)。

⁷ 李學智，〈政治節日與節日政治——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國慶活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第 43 卷第 5 期(南京，2006 年 9 月)。

⁸ 藤谷浩悅，〈近代中國の國民統合と龜裂——民國初期の湖南省を中心に——(近代中國之

的「新政」視為中國現代化之起源的觀點。

因此，本文試圖探討如下問題：清朝末期，「紀念日」這一新的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導入中國且發展開來的。非「民國公民」的「大清臣民」，在其中是被如何定位的。1912年開始的國慶日，到底是否具有劃時代性質。

2. 各國君主誕辰與清朝萬壽聖節

清末派遣到歐洲與日本的外交官，均在其日記或報告中，紀錄了與祖國相異的其他各國的多種政治文化。

同治 5(1866)年，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獲賜暇回國，清朝首次派遣歐美視察團與其隨行。參加該團的張德彝在英國滯留期間，於 4 月 13 日(5 月 26 日)日記中寫道：「中曆〔四月〕十一日，即西曆三月二十二日，係英國君主誕辰。各處懸燈結彩四日，金吾不禁，勝似元宵，當晚乃第三日也。遂於戌刻乘車街遊，見市廛閣巷樓檐皆燃煤氣燈，……是夜車聲轆轤，遊人濟濟。」⁹ 維多利亞女王(在位 1837-1901)的誕辰應是 5 月 24 日，文中的「西曆三月二十二日」有誤。對張德彝來說，在君主誕辰之日，街上懸掛燈籠彩綢，老百姓大舉上街遊逛，這是很令人驚異的情景。所以他將這些情景用「元宵」來比喻說明，而不是清朝皇帝的萬壽聖節。同視察團的斌椿亦在此後赴法時寫道：「〔七月〕初六日，晴，係彼國八月十五日，國王生辰。街市皆立大旗，通衢安玻璃燈數百萬盞。城鄉遊人填塞宮前大街長數里，陳百戲，夜放烟火，……五色明燈，璀璨滿天，燈火通宵不息，有用電氣燈照耀樓臺，異光奪目。」¹⁰ 這裡所謂「國王生辰」就是當時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在位 1852-1870)的伯父，拿破崙一世的生日。斌椿亦興致勃勃地記載了街上懸掛燈籠，人人上街慶賀，以及到處懸掛「大旗」的情景。

國民統合與龜裂——以民國初期湖南省為中心); 久留島浩、趙景達編，《國民國家の比較史》(東京：有志舍，2010年)，420-421頁。

⁹ 張德彝，《航海述奇》(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71頁。

¹⁰ 斌椿，《乘查筆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55 輯 545(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50頁。

對於清朝官員來說，慶賀君主誕辰這一習慣本身並不足為奇。自唐玄宗將自己的誕辰定為「千秋節」以來，歷代王朝均舉行儀式來慶賀皇帝誕辰，百官朝賀，大興宴會。清廷亦早在崇德元(1636)年定：元日、長至(冬至)及萬壽聖節京官進表慶賀。順治 8(1651)年又定：元日、長至及萬壽聖節為三大節，外官均設香案，朝服望闕行禮，與京官同。¹¹ 那麼，在英國與法國，令張德彝與斌椿驚訝的是什麼呢。如同他們文章中所指出的，第一個是，煤氣燈或電燈造成的明亮而燦爛奪目的夜景。另一個是，官員以外一般老百姓的熱鬧與「各處懸燈結彩」「街市皆立大旗」的情景。

光緒 3(1877)年，清朝在英國首次設置駐外公館。與第一任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同行的副使劉錫鴻，正遇當年女王之誕辰，亦作紀錄，稱：「〔四月〕二十一日，即西歷六月初二日，維多利亞慶生辰。伊國無朝賀之典，惟倫敦數百街中，結彩懸燈，花氣芬馥，男女往來如織，歌樂之聲闐然。」如上所說，維多利亞女王的生日是 5 月 24 日，但因 5 月 20-30 日英國政府休假停止辦公，所以此年在 6 月 2 日進行慶祝。劉錫鴻亦將英國君主誕辰不受朝賀而街上懸彩，老百姓遊行的習慣看作與清朝不同的政治文化。¹² 翌光緒 4(1878)年，隨同郭嵩燾、劉錫鴻赴英以後，又隨同出使俄國欽差全權大臣崇厚赴聖彼得堡的張德彝，對俄國的情景亦有記載，稱：「俄曆八月三十日，為東教先賢阿來三德誕辰，其名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位 1855-1881)〕御名，故市肆關閉，人工休息，各處掛旗慶賀。……晚各處燃燈，夏園旁之演劇處尤為繁盛，五色迷離，遠近莫辨。」¹³

光緒 3 年，作為第一任出使日本國大臣的何如璋，赴明治維新後已過 10 年的日本，在神戶登岸後，看到沿途排列的老百姓，人人手中揮動小旗歡迎，每家懸掛國旗燈籠，解釋其為「國主臨幸」時之禮法。

¹¹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 25 (1899)年，卷 296，1 頁。

¹² 劉錫鴻，《英軺私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124 頁。張德彝，《隨使英俄記(四述奇)》(長沙：嶽麓書社出版，1986 年)，405 頁。

¹³ 張德彝，《隨使英俄記》，736 頁。

戶戶高懸畫日旗，連宵華炬列千枝。

飛觴忘拜東鄰賜，錯認春燈夜宴時。

〔十一月〕初四日上岸，東人肩轂擊夾道歡迎。每戶皆懸旗，意以致敬。連夕沿岸張燈千萬計。其國主臨幸，蓋用此禮云。¹⁴

與張德彝對英國女王的誕辰覺得「勝似元宵」完全一樣，何如璋亦對此情景懷有「錯認春燈夜宴時」的感想。

黃遵憲當時以參贊的身份隨同何如璋赴日，看日本「三大節」的情景，吟詩稱：

堂堂黼座設朝儀 神武初元立國時 一百一聲聞祝嘏 滿城紅日早
懸旗

朝賀大禮歲有三大節。曰新年。曰天長，十一月三日。二月二十相傳為神武即位紀元之日，曰紀元節，尤重之。官皆大禮服，詣宮朝賀，放祝嘏一百一聲，人家皆懸畫日旗以伸慶也。¹⁵

新年是陽曆 1 月 1 日，「天長節」是明治天皇的誕辰。「紀元節」是陽曆 2 月 11 日，所以黃遵憲應該是筆誤。二戰以前的日本，以上述「三大節」為代表的國家紀念日，俗話叫做「旗日」。因為在一般老百姓看來，紀念日首先是懸掛國旗之日。

同治元(1862)年，清朝為了將歐美各國的船籍區分開來，決定以「黃色龍旗」為「中國官船」之旗幟。¹⁶ 同治 7(1868)年，清朝首次派遣正規外交使節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節團」時，各船隻與車輛均插黃龍旗，又在與美國、英國、法國、普魯士、丹麥、荷蘭、俄國等各國的外交儀式中使用此旗。¹⁷ 同治 11(1872)

¹⁴ 何如璋，〈使東雜詠〉；羅森等，《早期日本遊記五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77頁。

¹⁵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統編第10輯95（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35-36頁。

¹⁶ 同治元年閏八月甲辰恭親王奏文，寶鋆等修，《籌辦夷務始末(治朝)》，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611（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卷9，33-34頁。小野寺史郎，〈中国最初の国旗——清朝・黄龍旗について——（中国第一面国旗——論清朝之黄龍旗）〉，《中国研究月報》，第57卷第10號（東京，2003年10月）。

¹⁷ 志剛，《初志泰西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39頁。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

年，總理衙門照會各國，所有福州船政局，上海洋炮局所製的輪船及各關口的巡河船均揚此旗。¹⁸ 但是，早期黃龍旗的使用基本上限於船籍表示或外交儀式，在國內，官員以外的一般人沒有機會使用此旗。

那麼，在國內官員以外的老百姓，是什麼時候第一次懸掛國旗的？有 1920 年代的文章寫道：光緒 26(1900)年庚子事變之際，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從北京逃往西安的路上，隨同之保鏢「車高插黃龍旗，云是太后所賞。是時國內商民尚無插國旗之例，以為異數」。¹⁹ 另一篇 1920 年代的文章亦有記載：以前黃龍旗「僅限於稅關暨官有之輪船，商家未敢僭用。迨光緒辛丑(1901 年)，醇王(載灃)銜命赴德謝〔義和團〕戕殺克林德(Klemens von Ketteler)公使之罪，取道申江，滬商會以此舉有含垢忍辱之意，遂一致懸旗歡送，以表愛國之誠，……商店用國旗實自此始」。²⁰

雖然這些文章均是後來寫成，但由此可以推測，庚子事變以後，清朝對於「商民」的黃龍旗使用方針有所改變。

光緒 28(1902)年 6 月 26 日，是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從西安回北京以後第一次萬壽聖節（光緒皇帝的誕辰是 6 月 28 日，但因為 7 月 1 日是孟秋祀禮而前 3 天要齋戒，加以 6 月 27 日亦是齋戒日，所以 26 日舉辦萬壽聖節，25、26、28 日三天為假期）。²¹ 據此年創刊的《大公報》所記載，當天在天津「商民慶祝聖壽計，自閘口以及估衣街，天津城內外，河東河北各國暫領，地面方數十里，無不高揭國徽以誌慶賀」，因此「各界領地居民，臨時備辦措手不及，群向彩繪店，爭先購買盈尺之布。稍為塗鴉亦售重價。可見此時之盛矣」。「公所」亦大規模裝飾。「將正廳懸掛大小黃彩，四圍上下遍布五色彩紬氈墊等物。內外懸掛東西洋各式明燈，幾無隙地。客廳亦懸燈結彩，四壁遍張歷代名人書畫。陳設桌椅，悉仿西式，井井有條。院中巨

再述奇》(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89、98 頁。

¹⁸ 〈海船旗幟定式〉，《申報》(上海)，同治壬申 11 月 3 日。

¹⁹ 王照，〈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方家園雜詠紀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27 輯 266(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初版 1928 年)，15 頁。

²⁰ 〈滬商用國旗之始〉，陳伯熙編，《上海軼事大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初版 1924 年)，514 頁。

²¹ 〈熙朝掌故〉，《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6 月 30 日。

竿高揭黃龍旗幟，四面懸綴各樣彩燈，密如繁星。大門外以松柏織成門樓，嵌以無數鮮花，妍麗奪目。門樓上復懸掛各式燈彩及黃旗。東西牆壁懸掛巨燈八枚，製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八字，鉅盈五尺」。加以當天下午五時開始，在日本租界「日出學館」召開「萬壽祝典會」，「中華官紳衣冠到者二十餘人，皆按班行禮，整齊嚴肅。華僑到者百數十人，分二十人爲一班，共分七班，皆行三鞠躬禮。華人之以三鞠躬禮施於君者，自此會始」。會上還有參加者夫人等女士，她們亦仿行三鞠躬禮。記者稱：「皆能以開風氣爲己任者」。會場配有西語譯員與東語譯員，東西各報館主筆及日本總領事伊集院彥吉等十幾個日本人也參會行禮。七點方舉演說「士農工商四民與國家之關係，華民與光緒皇帝之關係及其責任，又勉勵與會諸君宜合群力扶助皇帝復位，以順民心」。²² 法租界的北洋醫學堂「高懸國徽，內外遍懸燈彩，十色五光」，招商津局、青年會等亦張燈結彩，「估衣街各舖戶亦添懸彩綢」，因此「異常熱鬧」。加以「北清印字局又粘出燈謎無數，酬贈極豐，津郡士夫聞之而往者頗眾，爭先恐後，濟濟盈門，誠自埠未有之鉅觀也」。²³ 當天『大公報』亦登載「萬壽祝辭」，稱讚「我皇上忠於國事」而其英明「實超越乎漢之孝武，雖俄之大彼得、日本之明治不是過也」，而呼籲「伏願凡我國臣民感激奮發，力洗舊染污俗，咸與維新，斯無負我皇上保國愛民之至意」。²⁴ 在上海有人亦計劃「慶祝會」，因爲「庚子歲萬壽聖節，如旅居外洋檀香山、檳榔嶼、新架坡等埠之中國商民，皆張燈懸旗虔伸嵩祝，惟上海獨付缺如」，其章程規定：「是日會中高懸國旗以崇國體」「是日會友齊集各抒所見，演說此會宗旨」等等。²⁵ 這些報道所介紹之萬壽聖節之景象，與清朝外交官在歐洲及日本所見到的各國君主誕辰之情景完全一樣。

有趣的是北京的情況。《大公報》報道：「去年(1901年)萬壽之日，京師臣民

²² 〈傳單照錄〉，《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6 月 26 日；〈慶典誌盛〉，《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6 月 28 日。

²³ 〈萬壽無疆〉，《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6 月 26 日；〈慶典餘聞〉，《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6 月 29 日。

²⁴ 〈萬壽祝辭〉，《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6 月 26 日。

²⁵ 〈上海慶祝會小啓〉，《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6 月 29 日。

西望遙祝，比戶多懸燈結彩，各局所亦有高挂龍旗者。今幸兩宮回京，故物依然，乃此屆聖節，民戶之燈彩蓋甚寥寥。嗚呼，上下之際可以觀國，君子於此覘文明政化之進步也。²⁶ 此年慈禧之萬壽聖節(10月10日)時，反之「所有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及洋商舖均高懸國旗以伸慶賀，其城外各民居舖戶亦奉傳諭一律結綵懸燈，同祝萬壽」，²⁷ 報道解釋：「自去年聯軍在京時，京城舖戶遇有慶賀始懸燈綵。今夏皇上萬壽，五城練局未曾曉諭，是以居民未敢冒昧，街市全無燈綵。茲屆太后萬壽，各街舖戶皆掛綢布紅條於門，實係練勇逐戶招呼之故」。²⁸ 可以說是庚子事變以後「舖戶」開始萬壽聖節懸掛國旗的證據。雖然在天津一般「居民」好像是主動地「高揭國徽以誌慶賀」，而在北京，「舖戶」沒有「傳諭」「曉諭」或「練勇」的招呼，是不敢懸燈籠龍旗的。

翌光緒 29(1903)年光緒皇帝的萬壽聖節之報道中有記載：「每遇萬壽，各家懸彩，自亂後已為成例」，²⁹ 同年慈禧太后的萬壽聖節之際，在北京亦「本日為皇太后萬壽之期，照例由各地面傳知舖戶懸挂彩綢」。³⁰ 可以看到，庚子事變以後開始的各家在萬壽聖節高懸國旗慶賀的習慣，1903年「已為成例」。

光緒 30(1904)年 10 月 10 日是慈禧太后 70 歲誕辰，所以此年萬壽聖節活動格外盛大。在北京，所有祝嘏人員均前往頤和園行禮，各國人士前往瞻仰者亦復不少。計祝嘏者，民二千餘名，官六百餘名云。³¹ 京中官立學堂，門首均懸掛綵綢燈籠龍旗，且初九日初十日停課兩天。³² 在天津，各國官紳及女眷齊到督署〔直隸總督衙門〕，慶賀以茶會觀戲，各行商董奉諭列擺燈棚，商務公所門前高搭彩棚列擺陳設。而且，採納縣署懇求，當天允許皇會作賽，於是天后宮泥像用黃輦舁出，繞走城內。³³ 當天，正在赴日留學途中路經武昌的宋教仁亦在日記中寫道：「余乃至街上遊覽，是日為清太后祝壽之期，滿街懸

²⁶ 〈諸夏無君〉，《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6 月 29 日。

²⁷ 〈時事要聞〉，《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10 月 12 日。

²⁸ 〈萬壽餘聞〉，《大公報》(天津)，光緒 28 年 10 月 13 日。

²⁹ 〈懸彩誌賀〉，《大公報》(天津)，光緒 29 年 6 月 28 日。

³⁰ 〈懸掛彩綢〉，《大公報》(天津)，光緒 29 年 10 月 10 日。

³¹ 〈萬壽盛典紀聞〉，《大公報》(天津)，光緒 30 年 10 月 12 日。

³² 〈萬壽停課〉，《大公報》(天津)，光緒 30 年 10 月 11 日。

³³ 〈皇會出賽〉，《大公報》(天津)，光緒 30 年 10 月 11 日。

燈結彩，家戶皆掛龍旗一隻，市上人往來雜踏，車馬之聲如鼎方沸，大有歌舞太平之象云。」³⁴

這次慈禧太后萬壽聖節之報道記載：「是日自早至晚街上游人紛紛如蟻，兼之官所民宅皆高揭龍旗以伸慶祝，實為庚子以前從來所未有云」，³⁵ 「自庚子年後，凡遇兩宮聖壽，即由各段巡勇傳諭舖戶懸掛彩綢以表賀」。³⁶ 在這裡可以看到，通過警察命令，街上商舖民居懸掛國旗這一新習慣，無疑是新政時期才開始的。

3. 萬壽聖節與紀念日

如上所述，清朝在新政時期，導入臣民懸掛國旗以慶賀君主誕辰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無疑是以清末外交官在歐洲與日本目睹之各國的習慣為參考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指出：外交官們於 1870 年代訪問歐洲或日本，那時正值選舉制民主主義廣泛開展以及大眾政治的開始出現，在這一環境下，為獲得臣民的服從與忠誠，歐洲各國採取新的方法，大規模製造公共儀式、紀念日、建築、廣場、紀念碑等「傳統」。³⁷ 因此模仿以上諸形式的清朝萬壽聖節，其目標亦可說是以君主為中心的國家統合。

但與此同時，另一個「紀念日」的概念傳入到清末文化界。其來源是當時世界上罕見的非君主國美國，以及經過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最終回歸共和制的法國。

祝典嗚呼起？所以紀念舊事業而獎勵新事業也。……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

³⁴ 宋教仁，《我之歷史》(臺北：文星書店，1962年，初版1920年)，第1、4頁。

³⁵ 〈慶祝萬壽紀盛〉，《大公報》(天津)，光緒30年10月12日。

³⁶ 〈普天同慶〉，《大公報》(天津)，光緒30年10月4日。

³⁷ David Cannadine, "The Context,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of Ritual: The British Monarc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 1820-1977"; Eric Hobsbawm, "Mass-Producing Tradition: Europe, 1870-1914",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he Tradition*,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之元氣。其用意至深且美。若美國之七月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為開國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大抵凡富強之國，其祝典愈多，凡文明之事業，其祝典愈盛。豈好為侈靡煩費以震駭庸耳俗目哉？所以記已往，振現在，勵將來。所謂歷史的思想，精神的教育，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

中國向無所謂祝典也。中國以保守主義聞於天下。雖然，其於前人之事業也，有讚嘆而無繼述，有率循而無擴充，有考據而無紀念。以故歷史的思想甚薄弱，而愛國愛團體愛事業之感情亦因以不生。³⁸

這篇文章是新政開始的光緒 27(1901)年，梁啟超為紀念《清議報》第 100 期刊行而寫下的，亦是清末最早明確主張近代國家中「祝典」「紀念」重要性的文章之一。

兩年後的光緒 29(1903)年元旦，梁啟超再次談到「祝典」：

東西各國，每年中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為國民榮譽之紀念。若美國之七月四日，法國之七月十四日，皆舉國臚歡，鼙鼓軒舞。使人際其日，參其會，忽起歷史上無限之感情，嚮往先民，而益以增長其強固勇猛進步自立之氣。若我中國則何有焉。所號稱一年中普天同慶者，惟此元旦。夫元旦則何奇。不過地球繞日，一周而復云爾。國民眾族以居此土者既四千年，乃曾無人事上歷史上可紀念可慶祝之一日。³⁹

寫這篇文章後梁啟超赴美，當地親自經驗美國獨立紀念日，寫詩如下：

此是君家第幾回 地平彈指見樓臺
巍巍國老陪兒戲 得得軍歌入酒杯
十里星旗連旭日 萬家紅爆隱驚雷
誰憐孤館臨淵客 憑陟升皇淚滿腮⁴⁰

以當地美國華僑為基礎而成立的保皇會，在光緒 31(1905)年制定的〈保皇

³⁸ 任公(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 100 期(橫濱，光緒 27 年 11 月 11 日)。

³⁹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敬告我國民(癸卯元旦所感)〉，《新民叢報》，第 25 號，(橫濱，光緒 29 年正月 14 日)。

⁴⁰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橫濱：新民叢報社，1904 年)，123 頁。

會公議改定新章〉中規定：「每年六月廿八日爲皇上萬壽，會員應行恭視禮。六月十三日爲保皇會創始日，應行紀念」。⁴¹

值得注意的是，「皇上萬壽」與「紀念」之間的區別。這個問題與上述梁啓超的「祝典」的定義有所關聯。梁啓超的前文中，「紀念」的對象只是過去的所謂「事業」。所以，假如遵照這項定義，則君主誕辰本身不會成爲生「愛國愛團體愛事業之感情」的「祝典」。這一點，與上述《大公報》之「萬壽祝辭」中通過強調光緒皇帝「忠於國事」，以及「萬壽祝典會」的演說通過強調「士農工商四民與國家之關係，華民與光緒皇帝之關係及其責任」，而將臣民、光緒皇帝、國家三者結合起來的嘗試，形成鮮明的對比。

其實，梁啓超寫這些文章的時期，在世界「富強之國」之中，極少有國家在君主誕辰、即位日或宗教祭日之外，以某種「事業」的紀念做爲主要的國家祭日。僅有德國爲慶祝普法戰爭中勝利的色當會戰(1870年)之「色當之日(Sedantag)」等一二例而已。日本亦從來沒有過「明治維新紀念日」。總之，梁啓超雖然說是「東西各國」，但當時有其描述的「祝典」的國家，世界上也只有美國與法國。而且，美國獨立紀念日暫且不提，7月14日成爲法國「國民祭(fête nationale)」且每年舉行「祝典」，是法國大革命後近一百年的第三共和政時期的1880年才開始的，⁴² 從1901年算來僅僅20年以前的事。

然而，梁啓超的這些文章，對於當時的立憲派與革命派，可以說是影響巨大。例如，光緒32(1906)年7月13日清朝宣布預備立憲上諭時，各地召開「紀念會」。在上海，響應學界商界的號召，7月21日各商店民居均懸國旗，召開演說會與宴會，商學補習會體育部、華商體操會、南市商業體操會等團體，穿著軍服或體操服，隨同軍樂隊遊行於市內。⁴³

⁴¹ 高偉濃，《二十世紀初康有爲保皇會在美國華僑社會中的活動》(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94頁。

⁴² Christian Amalvi, "Bastille Day: From Dies Irae to Holiday", in Pierre Nora and Lawrence D. Kritzman eds.,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Symbols, Vol.3. 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⁴³ 〈商學補習會祝典〉，《申報》(上海)，光緒32年7月23日；〈華商體操會祝典〉，《順天時報》(北京)，光緒32年8月2日；〈紀南市商業體操會祝典〉，《順天時報》(北京)，光緒32年8月3日。

另外還應該注意到，前述通過萬壽聖節實現統合國家之話語，多依靠決心變法自強的光緒皇帝這一英明君主的個人形象。

宣統 2(1910)年正月，《教育雜誌》登載了一篇名為〈宣統二年庚戌學曆〉的記事。這是學校一年中各項儀式的日程表，除了星期日、元旦、2月8月上丁、端午、中秋為假日外，還記著很多「紀念日」與「國恥紀念日」(表1)。

表1 〈宣統二年庚戌學曆〉，《教育雜誌》，第2年第1期，宣統2年正月。

正月初十	皇太后萬壽
十三	皇帝萬壽
二月十四	國恥紀念日(光緒戊戌〔1898年〕德國占租膠州灣訂約)
廿八	紀念日(道光戊戌〔1838年〕焚鴉片於〔廣東〕虎門外)
三月初一	紀念日(光緒丙午〔1906年〕宣布教育宗旨)
七月十三	紀念日(光緒丙午頒 詔預備立憲)
廿一	國恥紀念日(光緒庚子〔1900年〕聯合軍入京 兩宮西狩)
廿四	國恥紀念日(道光壬寅〔1842年〕與英國戰敗，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
八月初三	紀念日(光緒丙午 諭禁吸食鴉片，限十年戒盡)
初四	紀念日(光緒乙巳〔1905年〕始停科舉)
初八	國恥紀念日(咸豐庚申〔1860年〕英法軍犯京師 文宗出狩熱河)
十六	國恥紀念日(光緒甲午〔1894年〕與日本戰，海陸軍敗績)
廿七	孔子生日，行禮放假。
九月初一	紀念日(宣統己酉〔1909年〕各省諮議局成立)

〈附說〉有說明：「每屆紀念日，或於下午最後一時間停課開會，為學生演說當時之歷史，……演說之際，當以今日情形互相比較，於養成國民之愛國心大有裨益。」

該〈宣統二年庚戌學曆〉亦將「皇太后萬壽」「皇帝萬壽」(及「孔子生日」)與「紀念日」「國恥紀念日」明確區別。該「學曆」通過以「紀念日」「國恥紀念日」紀念「事業」，期望「於養成國民之愛國心大有裨益」，但並沒有期待「皇太后萬壽」「皇帝萬壽」等能夠發揮同樣的作用。這樣的想法的確與梁啟超之「祝典」概念相通。雖然該「學曆」作者不詳，但可以說有不少知識分子認為，在能夠以個人形象來獲得臣民忠誠的君主光緒皇帝(以及慈禧太后)死後，為了「養成國民之愛國心」，與其慶祝四歲宣統皇帝之萬壽，不如紀念鴉片戰爭以來「國恥」與新政的「事業」。

4. 結論

對於以打倒清朝為目的革命派來說，其理想目標自然是施行共和制的美國與法國。因此如開頭所述，辛亥革命以後，模仿美國獨立紀念日與法國革命紀念日而制定國慶日，也是順理成章。

1912年9月28日，臨時大總統令正式決定「武昌起義之日即陽曆十月初十日為國慶日」。並且列舉國慶日應行之事如下：「一 放假休息 二 懸旗結綵 三 大閱 四 追祭 五 賞功 六 停刑 七 卹貧 八 宴會」。⁴⁴

然而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這些活動並非全是辛亥革命以後才出現的。本文仔細探討了萬壽聖節「懸旗結綵」成為習慣的過程。「追祭」亦算是清末被落實的政治文化。⁴⁵ 以美國與法國為榜樣設立紀念日，此想法本身亦在新政時期即十分普及。「鞠躬」與婦女參加儀式等現象，也已經在新政時期的萬壽聖節中出現。此等新的政治文化，在構成「民國公民」的自我認同之前，被賦予構成「大清臣民」的新自我認同之期望。所以以上諸變化，與其說是辛亥革命以後突然出現，不如說是1901年以後在持續性的現代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⁴⁴ 《政府公報》，第152號，1912年9月29日。

⁴⁵ 吉澤誠一郎，《愛國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國をみる（愛國主義的創造——從國族主義看近代中國）》（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第五章，〈愛國ゆえに死す——政治運動における死とその追悼（為愛國而死——政治運動上之死及其追悼）〉。